

冯天瑜
主编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有 学 问 的 革 命 家

章太炎

陶 绪 史革新 著

北教育出版社 



冯天瑜 主编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

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

陶绪史革新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陶绪,史革新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356-0

I. 有… I. ①陶… ②史… II. 章太炎—学术思想—研究 N. B2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245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430015·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0.75 印张

版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5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536-0/K·72

定价:19.6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周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哲人王夫之将战国时期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学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

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14—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4世纪,正式展开于18—19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主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为“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

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 19 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 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 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延绵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吸纳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 19 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着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 20 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反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代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为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落,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间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引 言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时期的革命文豪,鲁迅先生尊敬地称赞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章太炎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历史关头不顾时人的冷眼,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中。他旗帜鲜明地猛烈抨击腐败无能、投降卖国的清政府,是“革命排满”的急先锋。他曾经七被追捕,三年牢狱,然其革命之志弥坚。他主编《民报》揭露时弊,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可谓不遗余力;他主编《民报》与改良派论战,笔端锋利,所向披靡,令人振奋激昂。他与孙中山、黄兴一道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重组光复会,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被袁世凯派兵软禁。张勋复辟和冯国璋、段祺瑞篡国时,他与孙中山一再联名通电声讨,并联袂赴粤,发动护法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拍案而起,痛斥蒋介石辱国丧师,风尘仆仆奔走于京沪之间,呼吁抗日。章太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和爱国者。

章太炎是一个有名的大学问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自成宗派的巨人。他对中国哲学、佛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乃至中医学诸领域,都有建树。他学识渊博,文笔古奥,自成一家。他在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时期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高峰,并且热情吸纳西方文化,运用来构筑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章太炎在哲学上“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糅合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① 在章太炎的著述中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有：哲学之定义、宇宙之根源、思维与存在、时间与空间、有与无、质与量、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谬误、感觉与思维、因与果、差别与同一、有神与无神等等，并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求索和思考，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在中国哲学史上，上自周秦老庄孔墨荀韩，中经汉魏六朝唐宋明清各家，下逮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近人，章太炎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中肯的评价。章太炎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都进行了辨别和分析，如对西方古代哲学的希腊爱利亚学派、斯多葛学派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对西方近代哲学举凡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谢林、尼采、培根、休谟、贝克莱、洛克、莱布尼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的著述，几乎无不称引。对于印度哲学史上的吠檀多、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法严、华严、涅槃、瑜伽诸经，章太炎也是随文引入。章太炎以中国哲学为基础，通过广采博收外来哲学思想精华，融会贯通，构筑起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

章太炎在经学上的突出成就，使他成为一代经学大师。他提出了“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的观点，明确指出被崇奉为万古不刊的典谟圣训的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礼》、《乐》、《诗经》、《易》“六经”只不过是一批历史文献，从而揭开了“六经”的神秘面纱，为正确开展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经学研究的使命在于了解上古发展的历史实际状况，决不是要按照一套经学教条来规范现实生活，只有从对“六经”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从中探寻古代社会“进化”的本来面目及其原因。尤为重要者，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

在扬榷“六经”旧说之时,必以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知识为指导,才能不断产生“新理”,使经学常新,否则,就仍会在迷途中盘旋踟蹰而不知返。由此可以看到,章太炎对经学研究的全部努力就是将经学的研究建立在近世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力图说明经学的现实意义。

章太炎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他对史学的功能、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治史的方法与原则、以及中国史学领域诸方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章太炎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国文明的兴盛与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史学发达与否,关系着民族的兴亡。他批评了把史学视为行贬褒、正名分工具的传统观念,反对肆意曲解或臆造历史的行为,指出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考察“社会政治盛衰蕃变之原”,“知古今进化之轨”,学者研究史学应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求”,“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①章太炎还认为中国旧史学详于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因而特别强调重视社会史、制度史、文明史的研究,同时也强调要加强种族、地理环境及包括建筑、工艺、食货在内的经济史的研究,这是因为了解和认识了生产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历史,就“足以远监宙合,存雄独照,不言金火之相革,而文明进退已昭明矣”。^②

章太炎专注于学术史的研究,他关于先秦诸子的一系列著述从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给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学术思想的宝库,他有关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著作被人们称为“空前的著作”;他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演变的研究、对隋唐经学和佛学的研究、对宋明理学和清代汉学的研究

① 《与王鹤鸣书》,《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卷2。

② 《尊史》,《馥书》五十六,《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等,都提出了自己独特而富于创见的见解,并多为后世学者所崇。人们称赞他为“儒宗”、“国学大师”、“学界泰斗”、“思想巨人”,是当之无愧的。

章太炎是并世无二人的革命大文豪,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变迁的轨迹时总结说:“自揣生平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章太炎学术思想由“俗”—“真”—“俗”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发展潮流相一致的。他在近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变迁的潮流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广泛吸收外国的思想资料和新的学科理论,“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使之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巨人。

正如章开沅先生所称颂的那样,章太炎的一生“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章太炎对于祖国的爱是浑厚而又深沉的,他从来都是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以至整个生命与振兴中华结合起来,与争取民族独立、追求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他强调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但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并未忽略对其陈旧部分的批判。他反对‘全盘西化’,但在融会中西文化方面却支付了极大的精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他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勤奋汲取新知,其涉猎之广、钻研之深、见解之锐敏,每每令人叹为观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新的高度上总结两千余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融铸各家,会通中外,蔚然成为一代宗师。当然,他的批判和抉择能力都难免受到时代的限制,因而其学术思想体系存在缺陷与失误亦多。但是,正如历史上一切卓越人物都不可能是白璧无瑕的完人一样,我们也难以要求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十全十美,无论人们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多少歧异,但至少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章太炎在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章太炎给我们留下一笔尽管瑕瑜互见然而毕竟是丰富多彩、光华夺目的巨大文化遗产。以他的学识渊博、思想恢阔、见解深刻和影响深远而言,完全可以进入世界

文化名人之列。”^① 章开沅先生对章太炎的评价是非常中肯和全面的,表达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章太炎的先哲精神,永远是后世的楷模。

^① 章开沅:《〈章太炎思想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引言	1
一 革命急先锋	1
1. 民族观的思想渊源	1
2. 早期民族观	9
3. 民族主义思想	21
二 走共和之路	38
1. 国家观的形成	38
2. 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	45
3. 对国家的认识及对议会制的批 评	52
4. 构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框架	59
5. 联省自治思想	69
三 徘徊真俗间	74
1. 早期唯物观	74
2. 唯心观的形成	84
3. 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91
四 培国粹国魂	106
1. 中西文化观的形成	106
2. 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与运用	